

从性别和婚姻状况的角度探讨代际支持 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 张莉

摘要:通过分析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本文从老年人性别和婚姻状况差异的角度探讨代际支持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数据显示,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平均得分比男性老人高。就代际支持而言,在经济支持方面,成年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远远超过父母给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且男性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大于女性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在工具支持方面,有近一半的被访老人有照顾孙子女的经历,且女性老人照顾的时长超过男性老人。在情感支持方面,男性和女性老人在和子女见面和联系的频率上也体现出了差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经济交换和老年人对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无显著影响,而情感支持却可以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但是无明显的性别差异。当将婚姻状况(丧偶)与代际支持的交互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后,照料孙子女能显著地降低有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但是照料孙子女却显著地提升了丧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本文提倡在研究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关系时将性别和婚姻状况纳入考虑的范畴来解析影响特定群体抑郁情况的因素,进而找到预防不同老年人子群体抑郁的策略。

关键词:代际支持;老年人抑郁;性别;婚姻状况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5-0028-11

一、引言

抑郁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也是复发性很强的精神疾病。老年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较其他年龄段要高。有研究指出,抑郁症的临床发病率通常是2.0%,而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是15.0%^[1]。以我国为例,2005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有13.6%的城市老年人患有中度及重度抑郁;而在农村老年人中,患中度及重度抑郁的比例为25.5%^[2]。可见,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较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在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的今天,探讨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已经成为研究健康老龄化课题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在研究老年人抑郁的文献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是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代际间的经济支持、工具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的转移被认为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在二者的关系上,现有研究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会提升其抑郁的风险。这是因为接受子女支持会使老年人感到自己的衰老和对他人的依赖,使得老年人失去自信,进而产生抑郁^{[3][4]}。另外,自理能力较差或者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需要高强度的日常照料,长期照料的压力难免会让子女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容易导致代际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下降,使老人产生无能感、失败感、负疚感,从而导致其抑郁水平提高^{[5][6]}。同时,老年人给予子女支持也会提升其抑郁的风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特别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如果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给老

作者简介: 张莉,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 2019-06-10

*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19CXTD04)。感谢秋丽雅同学协助我整理文献资料和处理统计数据。

年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对其健康和福利有害^[4]。老年人给予孙子女日常照料强度过高也会对其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7]。

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接受子女支持越多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越低^{[8][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发现,通过从子女或者孙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情感和照料支持,老年人能较好地从中走出来,有助于其身心健康^[10]。在子女提供给老年人的支持中,经济支持满足了老年人的经济需求,有助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11]。同时,老年人对子女或孙辈提供支持会增强老年人的自尊与独立感,增进老人的自发性并提升其意志力,从而满足老年人基本的心理需求。另外,老年人在与晚辈分享知识和经验的过程中,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他们与晚辈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样能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从而预防抑郁的发生^{[12][13][14][15][16]}。

前人的研究虽然增加了我们对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却没有深入地讨论性别和婚姻状况在二者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mediating effect)作用。事实上,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男女两性在建立和维系包含代际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上的差异。比如,有学者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各种社会支持更为敏感。这是因为女性较男性而言,对自己的社会和人的人际关系更加关注并且能够更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当中^{[17][18]}。就代际关系而言,仅有少数研究发现男女两性的差异较小。比如,Silverstein, Gans and Yang (2006)指出,在日常照料(即工具性支持)方面,老年人对日常照料的获得主要是根据其实际需要而定,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性别差异比较小^[22]。而更多的学者则强调了两性的差异。例如,有学者发现,男性老年人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的工具性支持比较多,而女性老年人则更容易接受成年子女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19][20][21]}。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与成年子女的日常生活情感交流较多,进而女性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情感支持较多。还有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提供给成年子女的支持中,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老年人而言更容易给子女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且女性老人提供的帮助即使在与配偶离婚以后也较男性老人更为稳定^{[23][24]}。除了代际关系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以外,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在建立和维系代际关系时也有差别。有研究发现,与已婚老年人相比,丧偶后的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交流更多,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帮助也更多^[25]。

性别差异也体现在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健康这二者的关系。有研究者发现,子女给予过多的工具性支持(即生活照料)对男性老人的健康有负面影响,而子女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则对女性老人的健康不利^{[26][27]}。还有学者发现,来自成年子女的非正式照料对老年女性的认知功能有负面影响,而对男性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却不显著^[28]。此外,互惠型的代际支持,特别是情感支持能提升女性老人的自评健康^[27]。而照料孙子女在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性别差异^[16]。

除了性别差异,婚姻状况也影响着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例如,有学者发现,丧偶对男性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比对女性的影响要大。因为对很多男性而言,他们在生活和情感上对配偶的依赖比女性要高,配偶可能是他们在生活中倾诉的唯一对象,因此失去配偶对男性的打击可能比女性要大。而女性有其他亲友或者成年子女去倾诉,来自这些人的支持可以减轻负面事件对她们健康的影响^[29]。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总体来看,尽管在已婚者当中,女性抑郁者的比例比男性高,但是女性老人较男性老人而言在丧偶后抑郁的风险却更低^{[30][31][32]}。以上的研究发现都说明,在老年阶段,性别和婚姻状况(特别是丧偶)会成为代际关系在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时候的调节变量。代际支持的模式、强度、以及代际支持对老人产生抑郁的影响会因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的研究发现,本文想要探讨在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中,性别和婚姻状况(特别是丧偶)是如何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前人在研究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关系时考虑了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变量,但是多数研究是把二者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较少有研究将代际支持和婚姻状况以及代际支持和性别的交互项引入研究,并将其作为重点来探析。另外,在为数不多的将性别和婚姻状况引入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文献中,基本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作为样本来分析的,较少有研究以我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30][33][34]}。这就使得现有研究的发现很难被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以中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将婚姻状况和性别的交互关系引入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文献中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去验证本文在文献综述开篇部分提到的

关于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两种假说。同时,本研究的发现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影响特定老年人子群体抑郁情况的因素,进而去找到预防不同老年人子群体抑郁的策略。

本文将代际支持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即经济、情感和工具支持)来研究其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本研究将男性和女性老人分成了两个子群体,并且在对两个子群体进行分析时引入了代际支持和婚姻状况变量的交互变量。本研究设定了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H1 代际支持对我国女性和男性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有显著不同;

H2 代际支持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在丧偶和有偶老年人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别。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以下简称 CHARLS)。CHARLS 是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全国性大型追踪调查。CHARLS 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中国的老年人,该调查旨在建立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库。该调查涉及的内容包括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状况到微观的个人健康状况方面的信息。该调查采用了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调查的样本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中老年人口。自 2011 年起,CHARLS 正式启动了全国性调查。调查在 2013 年对基线调查样本进行了跟踪。2015 年的 CHARLS 追踪调查覆盖了全国 150 个县、区的 450 个村,总计约 1.24 万户家庭中的 2.3 万名受访者成功接受了访问。从总体上看,样本能够代表中国中老年人群,具有极好的代表性。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抑郁问题,因此笔者将研究对象限制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在对样本年龄进行限定并删除无成年子女或孙子女的老人以后,本研究获得符合条件的老人 5075 人,其中男性样本 2832 人,女性样本 2243 人。

2. 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老人的精神抑郁程度,它通过 CESD-10 抑郁量表得到部分的反映。CHARLS 的问卷使用了一个包含 10 个项目的抑郁量表来测量老人在过去 1 周的精神抑郁状况。这 10 个问题分别是:(1)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2)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3)我感到情绪低落;(4)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5)我对未来充满希望;(6)我感到害怕;(7)我的睡眠不好;(8)我很愉快;(9)我感到孤独;(10)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在这 10 个问题中,8 个是负向问题(如我感到情绪低落),2 个是正向问题(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问题的选项都是 4 个,分别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 天)、不多(1~2 天)、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 天)、大多数的时间(5~7 天)。本文将这 4 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和 4 分(正向问题赋值方向相反)。而后本研究对该量表的选项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 为 0.795,说明这 10 个问题所测量的抑郁这一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信度足够高,可以用来衡量受访者的抑郁程度。所以,笔者将被访者在这 10 道题目上的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反映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变量,这个值越大说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越高。

就自变量而言,在经济支持方面,本研究用过去一年老年人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单位:元)以及过去一年老年人给成年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单位:元)为指标来测量代际间的经济支持。在情感支持方面,CHARLS 的问卷中问到了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率,以及他们与子女联系的频率。本研究将这两个问题生成的变量作为测量代际间情感支持的变量^①。被访者可以选择 9 个选项中的一项来作答(8=差不多每天,7=每周 2~3 次,6=每周一次,5=每半个月一次,4=每月一次,3=每三个月一次,2=半年一次,1=每年一次,0=几乎从来没有)。对于有多个子女的老人而言,本研究选取与各个子

① 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率和老年人与子女联系的频率没有相互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里的“联系”指的是老年人与子女在非见面情况下的互动方式,如通电话,发信息,视频聊天等。笔者在研究中之所以将二者视为两个独立的变量是因为:首先,CHARLS 的问卷将两者作为老年人与子女不同的互动模式来处理。更重要的是,笔者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很低(0.05,见表 1),这说明二者不太可能具有后者包含前者或者相互包含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被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将二者视为两种不同的代际互动方式了。因此本文将这两个问题所对应的变量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测量老年人与子女情感支持的变量。将这两个变量分开处理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探析与子女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是否显著的不同于其他的非面对面的代际互动模式。

女见面频率的均值以及与各子女聊天频率的均值来给老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率”和“与子女聊天的频率”这两个变量来赋值。具体到工具支持方面,CHARLS 的问卷中仅仅涉及了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工具性支持,而子女给老年人的自下而上的工具性支持并没有涉及。问卷中涉及工具性支持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孙子女?”以及“您在过去一年平均每周照顾孙子女几个小时?”本文用这两个问题来测量老年人提供给子女的自上而下的工具性支持。

由于测量代际支持三个维度的变量间有可能存在高度相关性,为了避免在回归模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了各个自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表 1)。结果表明,本文选用的测量代际关系的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

表 1 各个代际支持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1. 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	-				
2. 父母给子女经济支持	.08 ***	-			
3. 是否照料孙子女	.04 ***	.09 ***	-		
4. 照料孙子女的小时数/周	.03 **	.03 *	.35 ***	-	
5. 与子女见面的频率	-.07 ***	.03 *	.03 *	.00	-
6.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	0.18 ***	.17 ***	.17 ***	.04 ***	.05 ***

数值比较低(均小于或者等于 0.35)。这说明将这些变量同时带入回归模型在统计上是允许的。

此外,笔者还控制了老年人的年龄、居住地、工作类型、受教育程度、调查前一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社

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注: * $p<0.05$, ** $p<0.01$, *** $p<0.001$

交活动参与情况,患慢性病状况、是否残疾、身体是否有疼痛的情况、自评健康(5=非常好,4=好,3=一般,2=差,1=非常差),认知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ADL)。认知能力是通过测量老年人是否能够做到 24 项要求的任务来实现的。如果老人能做到要求的任务,就赋值为 1,如果不能,就赋值为 0。因此,认知能力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24 之间,数值越高,认知能力越强。CHARLS 中涉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的有 6 个问题。在每一项问题中,如果回答“没有困难”,则本文赋值为“0”;回答“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赋值为“1”;回答“有困难,需要帮助”和“无法完成”均赋值为 2。因此,IADL 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2 之间,数值越高,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差。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变量没有被引入是因为当将该变量引入模型时缺失值过多,会影响模型的总样本量。因此本文选择了控制 IADL 这个变量。除了这些常见的控制变量以外,本文在分析时还控制了老人子女数量以及子女的收入状况(0=没有收入,11=30 万元以上)。因为这些因素也被视为是影响老年人精神抑郁程度的重要指标。

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描述统计和 OLS 回归模型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中,笔者将老年人群体分成女性与男性老人两个子群体,并在两个子群体中带入代际关系变量与婚姻状况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性别和婚姻状况如何在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中起到调节变量(mediating variable)的作用。

四、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表 2 呈现了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并显示了男性与女性老年人子群体的特征。从抑郁程度上看,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老人(10.0 vs.7.5)。就代际支持的情况而言,在过去一年中父母给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远远少于成年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同时,数据显示,成年子女给男性老人的经济支持远远大于给女性老人的经济支持(31086.4 元 vs.5605.3 元)。因此在自下而上的经济支持方面,数据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过去一年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中,男性老人给子女的经济支持的平均额度略微高于女性老人,但是没有呈现出很明显的性别差异。本研究的工具性支持主要考察的是老年人对子代的支持,体现在老年人对孙子女的照料上。有近一半的被访老人回答自己或者配偶在过去一年有照料孙子女的经历,而且女性老人平均每周照顾孙子女的小时数明显高于男性老人(69.6 vs.57.1)。在情感支持方面,回答与子女“差不多每天见面”和“每周见面 2~3 次”的女性老人的比例略高于男性老人(9.2% vs.8.0%;11.5% vs.9.7%)。从总体上看,有半数左右的老

人是至少每半个月与子女见面一次。在过去一年中从来不与子女见面的女性和男性老人的比例均低于1.0%。从与子女联系的频率上看,多数(超过70.0%)老年人每个月与子女至少联系一次。老年人在与子女见面的频率上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子女每半个月联系一次和每周联系一次的男性和女性老人的比例均占到20.0%左右。因此在情感支持方面,男女两性老人所体现出的差异也不明显。在过去一年中几乎从不与子女联系的女性和男性老人分别占到被访者总数的11.7%和9.4%。可见,在被访的老人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与子女联系的频率都高于与子女见面的频率。

就被访老年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而言,数据显示,本研究样本的平均年龄是68.5岁,其中男性老人所占的比例高于女性老人(55.8% vs.44.2%)。另外,73.3%的被访者来自于农村。丧偶女性老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老人(42.9% vs.15.6%)。被访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女性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更低。男性老人所报出的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女性老人报出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被访老人子女数的均值是3。有超过半数的老人回答自己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从被访者的健康状况来看,男性老人在自评健康、认知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得分都略好于女性老人。慢性病患者、有残疾和身体疼痛症状的男性老人的比例均低于女性老人。这说明被访的男性老人总体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老人。从老年人子女的经济状况来看,其子女在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大概在1~2万元。总之,无论是在抑郁程度的得分上、在代际关系上以及被访者的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等方面,男女两性都体现出了差异(表2),所以就有必要将被访者根据其性别而界分为不同的子群体进而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表 2 对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均值(或%)	标准差	均值(或%)	标准差	均值(或%)	标准差
因变量						
抑郁程度(均值)	8.7	6.6	7.5	6.0	10.0	7.0
自变量						
1. 经济支持						
a. 过去一年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	19814.3	986312.1	31086.4	1320712.0	5605.3	18128.8
b. 过去一年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	2954.4	13377.0	3100.9	12131.9	2769.6	14800.4
2. 工具支持						
a. 过去一年是否照料孙子女						
是	46.4		47.1		45.5	
否	53.6		52.9		54.5	
b. 过去一年照料孙子女的小时数/周(均值)	64.1	204.5	57.1	163.8	69.6	231.5
3. 情感支持						
a. 与子女见面的频率						
几乎从来没有	0.9		0.8		0.9	
每年一次	8.4		9.0		7.7	
半年一次	11.0		12.6		8.9	
每三个月一次	13.4		13.4		13.5	
每月一次	15.9		15.1		17.0	
每半个月一次	15.6		15.4		15.7	
每周一次	15.9		16.1		15.7	
每周 2~3 次	10.5		9.7		11.5	
差不多每天	8.6		8.0		9.2	
b.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						
几乎从来没有	10.4		9.4		11.7	
每年一次	1.4		1.3		1.6	
半年一次	4.5		4.2		4.9	
每三个月一次	7.6		6.9		8.5	
每月一次	15.9		16.5		15.2	

(续表)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均值(或%)	标准差	均值(或%)	标准差	均值(或%)	标准差
每半个月一次	20.2		20.7		19.5	
每周一次	22.2		23.5		20.6	
每周 2~3 次	12.2		12.3		12.0	
差不多每天	5.6		5.3		6.0	
其他变量						
1. 年龄(均值)	68.4	6.6	68.3	6.4	68.5	6.8
2. 性别						
男	55.8					
女	44.2					
3. 所在地						
城镇	26.7		24.5		29.6	
乡村	73.3		75.5		70.4	
4. 婚姻情况						
丧偶	27.7		15.6		42.9	
有偶	72.3		84.4		57.1	
5. 受教育程度						
文盲	27.9		14.6		44.9	
小学及以下	47.3		53.6		39.3	
初中及以上	24.8		31.8		15.8	
6. 工作类型						
农业	45.3		50.1		39.3	
非农业	54.7		49.9		60.7	
7. 家庭人均年收入(均值)	8116.9	32859.7	9427.3	40792.9	6462.1	18368.5
8. 子女数量(均值)	3.2	1.5	3.1	1.5	3.3	1.5
9. 子女平均收入程度(均值)	4.5	2.3	4.7	2.2	4.2	2.3
10. 社交活动参与情况						
参加	52.8		52.3		53.4	
不参加	47.2		47.7		46.6	
11. 自评健康(均值)	2.9	.9	3.0	.9	2.8	.9
12. 认知能力(均值)	11.7	5.1	12.9	4.5	10.2	5.3
13. 是否有慢性病						
是	24.7		23.0		27.0	
否	75.3		77.0		73.0	
14. IADL(均值)	1.1	2.1	.7	1.8	1.4	
15. 是否残疾						
是	16.8		16.1		17.7	
否	83.2		83.9		82.3	
16. 身体是否长期疼痛						
是	32.0		25.4		40.3	
否	68.0		74.6		59.7	
N	5075		2832		2243	

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2. 回归分析结果分析

表 3 显示了对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程度的 OLS 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 1、2 和 3 体现了在引入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代际关系对我国男性和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模型 4、5 和 6 则在引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还添加了代际关系和婚姻状况(即丧偶状况)的交互作用项。这样,模型 4、5 和 6 便可以体现代际关系是如何通过丧偶状况来影响男性和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

结果显示,在没有引入交互变量的情况下,经济支持和工具支持变量对男性或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都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在情感支持的变量中,仅有与子女见面的频率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程度

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与成年子女联系的频率对男性或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没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与子女见面的频率每提升一个等级,男性和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分别降低 21.0% 和 25.0%。就模型 1、2、3 的结果来看,代际支持对男性和女性老人抑郁的影响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这样,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就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至少在情感支持方面,老人与子女见面越频繁,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老人而言,都越有利于降低老人抑郁的程度。

表 3 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回归分析: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变量	总体 模型 1	男性 模型 2	女性 模型 3	总体 模型 4	男性 模型 5	女性 模型 6
自变量						
1. 经济支持						
a. 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的自然对数	-.04	-.02	-.12	-.03	-.02	-.10
b. 父母给子女经济支持的自然对数	.03	.01	.07	.02	.03	.01
2. 工具支持						
a. 是否照料孙子女(参照组=否)	-.06	.15	-.55	-.21	.22	-1.47 *
b. 照料孙子女小时数/周	.00	.00	.00	.00	.00	.00
3. 情感支持						
a. 与子女见面的频率	-.23 ***	-.21 **	-.25 *	-.21 **	-.17 *	-.33 *
b.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	-.10	-.16 *	-.01	-.12	-.19 *	.02
交互变量						
1. 经济支持						
a. 接受经济支持自然对数 * 是否丧偶				-.05	.00	-.06
b. 给予经济支持自然对数 * 是否丧偶				.03	-.14	.16
2. 工具支持						
a. 是否照料孙子 * 是否丧偶				.80	-.30	2.14 *
b. 照料孙子女小时数/周 * 是否丧偶				.00	.00	-.01
3. 情感支持						
a. 见面频率 * 是否丧偶				-.08	-.28	.17
b. 联系频率 * 是否丧偶				.06	.14	-.08
控制变量						
1. 年龄	-.08 ***	-.05	-.12 ***	-.08 ***	-.05	-.12 **
2. 性别(参照组=女)	-1.49 ***			-1.48 ***		
3. 所在地(参照组=乡村)	-.07	.37	-.51	-.07	.38	-.52
4. 丧偶情况(参照组=有配偶)	.86 ***	.55	1.12 **	1.01	1.46	.32
5.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小学及以下	.42	.34	.56	.41	.38	.58
初中及以上	-.01	-.02	-.15	.00	.01	-.21
6. 工作类型(参照组=非农业)	.88 ***	.78 **	1.13 ***	.87 ***	.81 **	1.11 **
7.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00	-.01	-.02	.00	-.01	-.02
8. 子女数量	.05	.05	.01	.05	.05	-.01
9. 子女平均收入程度	-.13 *	-.05	-.25 ***	-.13 *	-.04	-.26 **
10. 社交活动参与情况(参照组=不参加)	-.32	-.35	-.31	-.31	-.33	-.23
11. 自评健康	-1.29 ***	-1.21 ***	-1.39 ***	-1.28 ***	-1.21 ***	-1.38 ***
12. 认知能力	-.12 ***	-.09 *	-.14	-.12 ***	-.09 *	-.14 **
13. 是否有慢性病(参照组=否)	.35	.28	.46	.36	.28	.47
14. IADL	.54 ***	.48 ***	.59 ***	.54 ***	.48 ***	.59 ***
15. 是否残疾(参照组=否)	1.12 ***	1.26 ***	1.03 *	1.11 ***	1.27 ***	.97
16. 身体是否长期疼痛(参照组=否)	3.75 ***	3.88 ***	3.58 ***	3.76 ***	3.87 ***	3.65 ***
CONS	19.54 ***	15.13 ***	24.03 ***	19.46 ***	14.84 ***	24.16 ***
R ² -squared	.33	.30	.32	0.34	.30	.33
N	2,571	1,547	1,024	2,571	1,547	1,024

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注:* $p<0.05$, ** $p<0.01$, *** $p<0.001$

当将代际关系和丧偶状况的交互变量引入模型 4、5 和 6 以后,结果显示,仅有工具支持的一个自变量(即“过去一年是否照顾孙子女”)与丧偶的交互项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其他代际支持变量与丧偶的交互项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这种显著性仅仅体现在女性老年人子群体中,即照料孙子女对女性老人抑郁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和有偶的女性老人相比,照顾孙子女使得丧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提升 67.0% ($-1.47 + 2.14 = 0.67$),也就是说,对丧偶女性老人而言,照料孙子女不是降低而是提升了她们抑郁的程度。这个发现就支持了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即代际支持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婚姻状况的差异而发生变化,而且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女性老人对子代的工具支持方面。在图 1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丧偶状况在给予子女工具性支持和女性老人抑郁程度关系上所体现出的调节作用。很明显,对于有偶的女性老人而言,照料孙子女能够降低其抑郁程度,而对于丧偶的女性老人而言,照料孙子女反而显著地提升了其抑郁的程度。

除了上述发现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大多数控制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丧偶、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日常工具性失能、残疾以及身体长期疼痛都会加重我国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而年龄的增长、男性、子女收入较高、好的自评健康、好的认知功能都能够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在上述这些方面性别差异不显著。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2015 年 CHARLS 数据的分析,从性别和婚姻状况差异的角度探讨了代际关系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进而去验证本文在开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研究结果显示,三种代际支持的维度在对男性和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影响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和工具支持都没有对样本中男性或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造成显著影响。在情感支持方面,频繁地与子女见面能显著地降低男性和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因而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当婚姻状况(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丧偶状况)的调节作用被引入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程度这二者的关系中,结果表明,婚姻状况确实能够调节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照顾孙子女对丧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有显著的负面效应,而丧偶状况的调节作用也仅仅体现在女性老人对子代的工具性支持上。这种调节作用在男性老人中以及代际支持的另外两个维度(即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上并没有体现。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仅得到了部分的支持。

上述的研究发现引发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在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中,仅有情感支持对我国老年人的抑郁产生抑制作用而另外一些代际支持的维度则不然呢?笔者认为,这可能突出反映了在我国当前社会中家庭内部的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经济支持可能已经不再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了,而情感支持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则上升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没有引入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给予工具性支持的变量,因而仅仅从老年人给予子女工具性支持的角度来看,工具性支持对预防老年人抑郁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只有在引入了代际支持与丧偶变量的交互项后,女性老人对子女的工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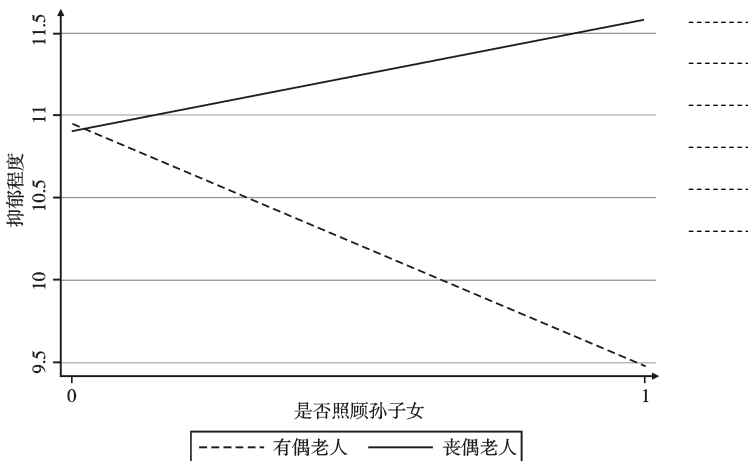


图1 给予子女工具支持与女性老人抑郁程度的关系:
以丧偶状况为调节变量

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数据
N = 1024

支持这一交互项对抑郁的作用才变得显著。这可能说明当我们把老年人群体视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时候,老年人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似乎不能提升被访老人的主观效能感和价值感。而当我们把不同婚姻状况的老人分开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对丧偶的女性老人而言,给子女提供工具性支持反而加剧了其抑郁的程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工具性支持对于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需要我们把老年人群体划分成不同的子群体进行研究,或者引入某些与代际支持变量的交互变量才能体现出来。

虽然情感支持变量在本研究中表现出了比较明显地抑制老年人抑郁的作用,但是本文发现情感支持的变量对男女两性抑郁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似乎是相悖的。前人有研究指出,情感支持对女性老人抑郁的抑制作用超过其对男性老人抑郁的抑制作用^{[33][34]}。本文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本研究样本与其他研究样本的不同所导致的,另外一个方面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引入的测量情感支持的变量与其他学者的不同。比如,在Guo、CHI和Silverstin(2015)的研究中,他们用来测量代际间情感支持的变量是:(1)总体而言,您觉得您和子女相处得如何?(2)您觉得您和子女有多亲近呢?(3)当您需要与子女倾诉一些问题或者苦恼的时候,您觉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倾听呢?^[33]可见,这些测量情感支持的变量反映的都是老年人对他们所获得的情感支持的主观感受和判断,因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容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本文用到的测量情感支持的变量是:(1)过去一年老年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率;(2)过去一年老年人与子女联系的频率。这两个变量对代际间情感支持的测量相对比较客观。因此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们用一些相对主观的维度去测量代际间情感支持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就表现得与这些变量的关联性比男性老人更强。而当我们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描述代际间情感支持的变量去研究其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时,性别所体现出的差异就不明显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性别作为调节变量在调节情感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将会随着测量情感支持指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提醒我们选择适当的代际支持(含情感支持)变量的重要性,因为变量的选取可能会影响我们研究的结论。同时,这些研究结果也提醒我们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并没有支持本文在开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但是读者对这个结论还是应该谨慎解读。

本研究的一个发现是丧偶对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仅仅体现在工具支持方面,而非其他维度。前人的研究表明,较男性老人而言,女性老人丧偶后在经济上更倾向于依赖成年子女的资助并把这种资助作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因而男性老人与成年子女在经济上的代际交换受到丧偶事件的影响较女性老人而言是比较小的^[35]。所以笔者预期的结果是对丧偶的女性老人而言,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显著地降低她们的抑郁程度。然而研究的结果却发现,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老人而言,代际间的经济交换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都不显著,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老年人是否丧偶而发生变化。这可能又一次说明了在本研究所分析的老年人样本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已经退居到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在情感支持方面,由于前人的研究强调丧偶事件对男性老人比对女性老人的负面影响要大,特别是在精神健康方面^{[29][30][31][32]},所以笔者预期代际间的情感支持能显著地降低丧偶男性老人的抑郁程度。但是研究的结果却表明情感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不会因为男性或女性老人是否丧偶而发生变化。笔者在此再次提醒读者,本文的这个结论可能和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情感支持的变量有关。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测量代际间情感支持的指标来验证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本文所发现的照料孙子女能降低有偶女性老人的抑郁程度,但是却对丧偶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不利这一事实可能说明照料孙子女对有偶和丧偶女性老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对前者而言,照料孙子女很可能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活动;而对后者而言,照料孙子女可能加重了丧偶女性老人的日常负担。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倡导对丧偶老人,特别是丧偶女性老人的关心,尤其是在日常照料方面。总之,本文提倡在研究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抑郁的关系时,将性别和婚姻状况纳入考虑的范畴来探析影响特定群体抑郁情况的因素,进而去找到预防不同老年人子群体抑郁的策略。

参考文献:

- [1] 夏艳玲、刘中华:《中国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福利对抑郁状况影响研究》,载《调研报告》2018年第1期。
- [2] 伍小兰、李晶、王莉莉:《中国老年人口抑郁症状分析》,载《人口学刊》2010年第5期。
- [3] Dean A., Kolody B., Wood P.etal. "The Effects of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on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rson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9, 17: 341-355.
- [4] Chen, X. & Silverstein M.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 43-65.
- [5] Momtaz A.Y., Ibrahim R. & Hamid T.A. "The impact of giving support to others on older adults'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Psychogeriatrics*, 2014, 14(1): 31-37.
- [6] Krause N., Liang J. & Gu S. "Financial Strain, Received Support, Anticipated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8, 13: 58-68.
- [7] Liu X., Liang J., Gu S. "Flows of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among Older Person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5, 8: 1175-1184.
- [8] 陶裕春、申昱:《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载《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3期。
- [9] 彭华茂、尹述飞:《城乡空巢老人的亲子支持及其与抑郁的关系》,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年第6期。
- [10] Siebert D.C., Mutran E.J., & Reitzes D.C. "Friendship and social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role identity to aging adults", *Social Work*, 1999, 44(6): 522-533.
- [11] Cong Z.,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 5: 6-25.
- [12] Deci E. L., La Guardia J.G., Moller A.C., Scheiner M.J. & Ryan R.M. "On the Benefits of Giving as well as Receiving Autonomy Support: Mutuality in Close Friend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6, 32(3): 313-327.
- [13] Lee G. R. "Ag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88, 8: 448-450.
- [14] Piercy K.W., Cheek C., & Teemant B. "Challenges and Psychosocial Growth for Older Volunteers Giving Intensive Humanitarian Service", *The Gerontologist*, 2011, 51(4): 550-560.
- [15] 周晶、韩央迪、Mao, W.Y., Lee, Y., Chi, I.:《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载《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7期。
- [16] 靳小怡、刘妍璟:《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载《东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17] Antonucci T.C. & Akiyama H. "An examination of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among Older Men and Women", *Sex Roles*, 1987, 17(11-12): 737-49.
- [18] Uchino B.N., Cacioppo J.T. & Kiecolt-Glaser J.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A Review with Emphasis on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3): 488-531.
- [19] Silverstein M., Gans D. and Yang F.M.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27(8): 1068-1084.
- [20] Ofstedal M.B., Reidy E. and Knodel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Support and Well-being of Older Asia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04, 19(3): 165-204.
- [21] Reevy G.M. & Maslach C. "Use of Social Support: 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Sex Roles*, 2001, 44(7/8): 437-59.
- [22] Umberson D., Chen M.D., House J.S., Hopkins K. and Slaten E. "Th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e men and Women Really so Differ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1(5): 837-57.
- [23] Agree E. M., Biddlecom A. E., Chang M.C. and Perez A. E. "Transfers from Older Parents to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02, 17(4): 269-294.
- [24] Furstenberg F., Hoffman S. D. and Shrestha L. "The Effect of Divorce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New Evidence", *Demography*, 1995, 32(3): 319-333.
- [25] Utz R.L., Reidy E.B., Carr D., Nesse R. & Wortman C. "The Daily Consequences of Widowhood: the Role of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n Subsequent Housewor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4, 25(5): 683-712.
- [26] 宋璐、李树茁:《代际交换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纵向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4期。
- [27] Li S., Song L. & Feldman M.W.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Health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A Gender

- 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Australas Journal of Ageing*, 2009, 28(2):81-86.
- [28] Bonsang E. & Bordone V. "The Effect of Informal Care from Children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of Older Parents", *Netspar Discussion Paper*, No.01-08, 2013.
- [29] Stroebe M., Stroebe W. and Schut H.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1, 5(1):62-83.
- [30] Sonnenberg C. M., Deeg D. J. H., Van Tilburg T. G., Vink D., Stek M. L. and Beekman A. T. 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in Later Life",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013, 25(1):61-70.
- [31] Friedman J., Knodel J., Cuong B. T. and Anh T. S. "Gender Dimensions of Support for Elderly in Vietnam", *Research on Aging*, 2003, 25(6):587-630.
- [32] Stroebe M., Stroebe W. and Schut H.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1, 5(1):62-83.
- [33] Guo M., CHI I., and Silverstin M.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Do Gender and Widowhood Make a Difference?", 2015, 1:1-30.
- [34] Fiori K.L. and Denckla C.A.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 Middle-Aged Men and Women: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012, 24(3):407-38.
- [35] Li L., Liang J., Toler A. and Gu S. "Widowhoo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Chinese: Do Gender and Source of Support Make a Differenc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 60(3):637-647.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Elderly Depression in the Perspectives of Gendered and Marital Status

ZHANG Li,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aking gendered and marital status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examines data from the 2015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n Chinese elders' de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level of depression for elderly wome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elderly men. As to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 elderly received much m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ir adult children than financial support transferred from the elderly to their adult children. Elderly men also received much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did from their adult children. Regarding instrumental support, about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had the experience of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And elderly women reported longer hours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than elderly men. In terms of emotional support, on average,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eing or having contact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between elderly men and wome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exchanges or instrumental support to children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lders' level of depression. When the interaction term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widowhood were included in regression model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idowhood did no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with elderly depression. But it moderated the way in which instrumental support affected female elders' depression. In specific, the effect of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on married elderly women's depression remained negative but such an effect turned into positive among widowed women. The finding implies that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di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elders' depression. The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studying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n elderly's depression. Preven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tailored based on elderly subgroups'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elderly depress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lderly depression; gender; marital status

责任编辑 吴兰丽